

西出陽關

向達與西北史地考察團



敦煌千佛洞上寺（雷音寺）與中寺（皇慶寺）外觀（1942.6-9，石璋如、勞幹在敦煌莫高窟調查拍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羅 丰

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22 期 2011.06

引言

在現代學者中，名字能與自己的著作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向達（1900-1966）和《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要算一個代表。他沒有華麗的筆調，卻有著持續的影響，贏得廣大範圍讀者長期稱頌的，是他淵博的學識、精湛的研究。由於諸多的因素，向達再沒有能寫出超過這部著作的作品，或許對一個偉大學者來說這已經足夠了。

四〇年代初的向達，已是治中西交通史的名家了。但熟讀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的他，並不滿足作一個純粹的書齋歷史學家。向達自告奮勇前往西北，沿著河西走廊進行考察。西北考察是向達終身引以為自豪的大事，直到多年以後仍與人津津樂道，自稱「萬里獨行俠」，用於紀念這次考察。（圖一）^①



圖一：向達（作者提供）

一、向達的名義

抗戰正酣的一九四二年，「開發大西北」、「到大西北去」，成為全社會響亮而誘人的口號。官員、藝術家、作家、記者各色人等紛湧而至，以旅行西北為時尚。象牙塔中的學者們也不甘寂寞，醞釀成立中央西北史地考察團，配合政府國策。夏鼐在以後替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起草的文件中申述理由：

甘肅高原，史前故迹，冠越各省。河西走廊，尤為古代國際重要交通路線，所經亦為西北國防重地。漢唐時代，在此經營，不遺餘力，其遺迹至今歷歷可見。今日開發西北之聲，甚囂塵上，然不具知古人之措施，何以能得一時之成效？敝所有鑒於此，故於去年與中國地理研究所合作組織西北史地考察團。^②

向達從一九四二年九月開始至一九四四年十月結束，風塵僕僕地參加了中央研究院等單位組織的西北考察活動。至於這兩次活動分別以什麼名義參加，以往介紹向達

① 周清澍曾回憶向達最為得意的是他四〇年代的西北考察活動，曾自稱「萬里獨行俠」。參見周清澍，〈回憶向覺明師〉，收入沙知編，《向達學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頁210。

② 此件原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向內政部、教育部申請探掘甘肅古物執照之公文草稿，文稿並無具名及日期，只是字跡為夏鼐所書，此事亦為夏鼐所辦理，時間大約在一九四三年七月。文中「故於去年與」的「與」字前補加「參加」二字。

的文章卻無清晰的表達，其中包括曾經追隨向達進行第二次考察的閻文儒等撰寫的〈向達先生小傳〉也僅稱：

受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約，先生于一九四一年赴河西入敦煌，考察莫高窟……一九四三年先生任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組長（夏鼐先生任副組長，文儒任組員），再次赴河西敦煌。^③

張廣達亦稱：

1942年春，在當時開發大西北的呼聲中，重慶中央研究院曾組織包括地理等學科的西北史地考察團。考察團的歷史考古組由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館、北京大學聯合組成，向先生代表北大，並出任組長，副組長為稍後去西北的夏鼐先生，組員有閻文儒先生。先生因此而得以在1942年9月至1943年7月及1944年兩次到河西走廊及敦煌。^④

類似的表述難免使人產生一些誤會，後來的學者如榮新江在評述向達敦煌學貢獻時，用了相當的篇幅討論了向氏參加西北考察活動的名義，並指出，北京大學顯然係參加單位，「而整個印發材料中沒有『北京大學』字樣」。^⑤孟彥弘在替向達作傳時引用了向達〈自傳〉：

一九四一年那時候的中央研究院組織了西北史地考查〔察〕團，在額濟納河和敦煌一帶進行考古工作，要我參加。……我自己從重慶經蘭州到敦煌。一九四二年夏回李莊，一九四三年春又同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人從四川出發，再到敦煌巡行發掘工作，當年冬我一人先回四川。

同樣以不少的文字來討論史語所與北京大學之間的關係，並有一些推測：「北大作為合作單位之一列入。『這也算北大的科學工作吧』，點出了此次考察北大作為單位之介入，實在是借了些向達的光吧」。^⑥

向達本人略有含混的說法，顯然與當時的政治形勢有關，如「要我參加」之類的表述。實際上，以上諸人討論僅截取向達考察活動的某一階段的名義或活動，並非向達當時的全面相。

③ 閻文儒、閻萬鈞，〈向達先生小傳〉，閻文儒、陳玉龍編，《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頁813。

④ 張廣達，〈向達先生文史研究的貢獻〉，《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收入《張廣達文集·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197。

⑤ 參見榮新江，〈驚沙撼大漠——向達的敦煌考察及其學術意義〉，《敦煌吐魯番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第七卷，頁104-105；後收入榮新江編，《向達先生敦煌遺墨》（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10-13。

⑥ 參見孟彥弘，〈一位倔犟的歷史學家——向達別傳〉（未刊稿），頁11-13。

抗戰開始向達由法國經越南、香港輾轉返國，北平圖書館南遷，他失去原職，回到湖南老家。半年後，攜妻帶子前往廣西的浙江大學任教。^⑦其實，以向達的個人意願來說，他非常不願教書，曾告訴傅斯年，非要出來教書，以養家糊口，則只有去浙江大學。因為，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是向氏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老師，有師生之誼，當年也曾得到過竺氏的具體指導。^⑧向達不願教書和他並不擅長講課有關，他早年的學生鄧銳齡曾回憶向達：

他給人的最初的印象是約一位近五十歲的中年教授，身軀寬大結實，穿著臃腫的薄棉襖，面容黧黑，五官大而端正，戴著近視鏡，一頭黑髮。他先走下講臺親手發給我們油印的講義，全是文言文，字體端秀，應是他手刻的。然後神態凝重、聲音低沉，低頭看著講稿開講，偶爾在黑板上寫些難字或英文，又轉身低頭續講，不看聽眾，直到下課。^⑨

多年後的學生也說向達「平日說話行事，了無情趣，講起課來也是乾乾巴巴」。^⑩傅斯年勸向達到北京大學任教，又以可得中英庚款委員會研究補助款相助，使向達有點動心。傅斯年由昆明回到成都後，隨即著手向北大校長蔣夢麟（號孟鄰）推薦向達，又找中英庚款委員會負責人杭立武爭取補助名額。北京大學這時也有意要恢復「文科研究所」並設專任導師。文科研究所戰前由胡適主持，這時的胡適，遠在美國，任駐美大使，擬由傅斯年任所長，所以傳出延攬人才。經與蔣夢麟、姚從吾（史學系主任）、湯用彤（文學院院長）等人商量之後，傅斯年正式寫信邀請其加盟北大文科研究所，其辦法如下：

一、專任導師（教授皆兼任導師），不教書。

二、以自作研究為主體，並指導與先生治學有關之研究生（人數必極少，全所有給之研究生僅十人，其屬於先生範圍者決不多）。專任導師等於教授，其待遇則薄者，因不如此，在學校行不通也。

三、月薪二百元（目下五十元外，七折實數為一百五十）。故如此一事業得到外間補助，可不折。此等事，尊意必不計校〔較〕，然弟承人之囑，當以聞也。

四、不兼他職。此在先生亦無問題。

⑦ 《史語所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李 25-1-3。

⑧ 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和東南大學期間，隨竺可楨專門學習地理和氣象的數十人中，就有向達。參見胡煥庸，〈竺可楨先生——我國近代地理學的奠基人〉，紀念科學家竺可楨論文集編輯小組編，《紀念科學家竺可楨論文集》（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1982），頁 3-4。

⑨ 鄧銳齡，〈憶向覺明師〉，沙知編，《向達學記》，頁 163。

⑩ 郝斌，《“我要有個三長兩短”——記“牛棚”裡的向達》，《萬象》2009.6：49。

傅斯年覺得這樣的安排，「此事與先生不教書之原則甚合，而此間書籍較多，或有其便利處」。^⑪並將此信另抄一副本，寄達竺可楨，不使向達有違約之困惑。不久，向達愉快地來到昆明的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家眷安頓在昆明郊外的浪口村。

向達參與調查的名義，其實很早前就在籌劃之中，一九四一年初就被聘任為史語所的專任研究員。^⑫向達在收到聘書後，致信傅斯年：

史語所聘書已於上月寄到，擬俟左右康復之後，再行報命。敦煌調查事，諸荷擘畫，感激無似。自惟來滇兩載，百無一成，而諸公曲予優容，不加譴責，每念及此，慚感交集。調查一事，自知學力不足，難期良果，唯冀以勤補拙，或可不至寶山空還。至於史語所之與北大研究所，氣息相通，有同一體，固可不分彼此。^⑬

並表示供職何處，他本人並無成見。只是在向達被史語所聘請案中，北京大學並不痛快放人，多方挽留，致事有延宕。七、八月間又傳考察團可能在八、九月間起程，向達內心十分焦急，八月初馳書傅斯年陳明理由：

夏初曾上一函，想荷答及。六月間閻文儒抵渝，晉謁左右，來書道及尊況，深以為慰。……史語所與中央博物院合組西北考察團，定期八九月之間出發。七月初凌純聲先生來函，轉致濟之、彥堂兩先生盛意，屬達加入，當以為期過促，所餘時間不到一月，無論安頓眷屬，準備閱讀西北地志，以及自滇赴川，任何一事，俱難措置就緒，故只有復書辭謝，區區下忱，先生當能諒之也。^⑭

事實上，考察團並沒有那麼快組成出發。向達猶豫在北大與史語所之間。年底時傅斯年請他儘快拿定主意：

看來此事必須作一段落，即先生自本月或下月份起，不作北大專任教授，即作敝所之專任研究員。敝所之決定請先生，早此一年已便決定，未知已收到聘書否？但職員錄上則已列入矣。（此文書處但據發聘記之也。）故駕來敝所，極其歡迎，但北大不肯放，其情真摯。好在所作是同一之事，即是到燉煌去，兩者似無所分別，乞先生就近商之于北大諸同仁，並乞示知至幸。^⑮

史語所年初聘人，年底仍未獲當事人明確回應，傅斯年直接詢及：是否收到聘書？並按照文書處發聘的時間已將向達列入「職員名錄」，語氣委婉曲回，但透著一絲嚴厲。

⑪ 〈傅斯年函向達〉（1940.4.20），《史語所檔案》李 14-28-1。

⑫ 〈研究員聘書〉，由代理院長朱家驊具銜，訂約書期為民國三十年（1941）一月至十二月底止，薪水以國幣每月肆佰元按月致送。

⑬ 〈向達函傅斯年〉（1941.5.10），《史語所檔案》李 14-28-3；《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 413。

⑭ 〈向達函傅斯年〉（1941.8.10），《史語所檔案》李 38-2-16；《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 413-414。錄文筆者依原件校過，下同。

⑮ 〈傅斯年函向達〉（1941.11.8），《史語所檔案》李 14-28-2，《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 414。

向達看到傳信後，即托天文所的李國鼎先生將聘書退回，代為面繳史語所。¹⁶（圖二）

史語所原本打算要去西北考察的人很多，準備讓李濟任考察團長，吳金鼎、勞榘、夏鼐、徐旭生等人都在名單中，除向達外，李濟還想請一位專治佛教藝術的學者加盟，但未有合適人選。向達有聞黃君（可能是黃文弼）任團長的傳聞不確。籌劃中的經費應該支持兩年的考察活動。¹⁷傅斯年竟用李濟應在安陽考古工作之外，另有一大事，方可對得起此生，而西北考古亦屬此事等語相激，促李西行。¹⁸無奈李濟剛遭遇喪女之痛，心灰意冷，數月終夜無眠，以只求有所解脫，不必再舉輝煌為由，堅辭不就。¹⁹

向達兩次考察活動所用的名義及代表的單位並不相同。一九四二年考察團的名稱是「西北史地考察團」，由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館籌備處及中國地理研究所三個單位組成。向達時為西南聯大教授，由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聘請參加。²⁰當時由於史語所所長傅斯年代理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史語所代理所長職務落到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李濟頭上，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則由總幹事曾昭燏代行。所以向達給曾昭燏寫信彙報，並非出於私誼，而是著實的工作報告。等到一九四二年十月底向達到敦煌後，北京大學由校長具名向中央研究院申請合作，中研院復函同意，但在以後並未用到北大名義，只有第二次開始合作單位始有北大。一九四三年考察團的全稱為「西北科學考察團」，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地理研究所和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四個單位共同組成。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派向達及閻文儒參加。²¹

二、並不順暢的開始

中央研究院的代理院長朱家驊是西北考察活動的第一推手，他積極鼓吹西北科學考察，主張大家都要去西北開闢科學的新天地。秉承朱的旨意，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葉企孫主持了一個談話會，確定西北史地考察團的有關事項。有一份會議記錄記載了這次活動：²²

¹⁶ 〈向達函傅斯年〉（□.2.22），《史語所檔案》李 38-2-14。

¹⁷ 〈傅斯年函向達〉（□.11.8），《史語所檔案》李 14-28-2；《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 414。

¹⁸ 〈傅斯年致李濟信〉，李光謨，《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頁 315。

¹⁹ 〈李濟致傅斯年信〉，李光謨，《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頁 314。

²⁰ 參見石璋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年表》（簡稱《考古年表》）（楊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2），頁 102。

²¹ 〈總辦事處來函〉（1942.11.6），後附抄北京大學來函及本院復函，《史語所檔案》李 38-1-9；石璋如，《考古年表》，頁 102。

²² 〈西北史地考察團談話會記錄〉（1942.04.08），《史語所檔案》李 38-1-5。

孟真先生侍在敝處春候惟
赴居多福為祝為頌敦煌之行據濟之先生未教至今尚在討
論之中近來局面甚繁此是不急之務自應從緩遲未決不立
怪也去歲承白熱史語所懷擁之意感荷、特以閩海近處形
勢禁嚴迨至今尚不知如何報
命言之增愧茲因天文研究所友人李國鼎先生赴渝之便
懇具時研究院聘約代為面繳如有
原恕則幸甚吳王庚會方面求
左右雅意代為呈報數事未獲應領為得免凍餒俟出
先生之賜唯自去秋以來此間生活文化太劇緩急之間殊
難應付與教士先生及錫予老師商量結果七月以後至所
大領薪共七十九元三月庚會協款八百四十元由恭三兄轉遞
昆明當以當近不堪逐一併借用此數在今年暑假前必設
法歸還至於十月以後協款之事先在莊君已函恭三元請其
延至四月庚會吳雲書校注初稿未清本年已留得四分之三
不久即可歲事離漢時當將此案交錫予老師並請其
特呈
左右教正藉當文科研究所及庚會工作報告因知淺陋
之作不足為塵
高明之目唯為求教數年未工作告一段落計應忘
其工拙正之忱不敢求
諒也謹此上
回不盡一、叩叩
道安 後學 向達 謹拜 二月廿二日

圖二：〈向達致傅斯年信手稿〉，《向達先生敦煌遺墨》圖版。

時 間：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八日下午三時。

地 點：國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

出席者：葉企孫、石璋如、勞榦、李承三、吳印禪（辛樹幟代）、王敬禮、劉次蕭。

會議討論三件事：考察團的名稱為「西北史地考察團；經費此次為二十一萬一千元，由中央博物院撥十一萬元，管理中央〔英〕庚董事會撥五萬元，中央研究院撥五萬一千元」。考察團分為兩組，歷史考古組有石璋如、勞榦、向達。地理及動植物組李承三、周廷儒、辛樹幟、吳印禪。歷史考古組中原本有高去尋，傅斯年覺得經費緊張，將其名字最終劃去。名譽團長是朱家驊，西北農學院院長辛樹幟任團長，中國地理研究所所長李承三為總幹事，總會計是王敬禮，會計是石璋如。中央博物院雖為發起單位之一，但並沒有派員，而是由向達代表參加。不過，在有關考察團所獲標本的分配

方案中決定，「任何標本只一份，應歸中央博物院；如有副本，則其副本得歸各團員之服務機關」。並規定所得一切古物均應歸中央博物院。研究報告，地理方面由中國地理研究所印行；動植物方面則歸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歷史、考古報告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或中央博物院印行。

困難時期的經費分配當然也是要討論的重點，每位團員的往返差旅費一萬元，共七萬。警工費五萬，運費二萬，設備費個人為單位者共一萬四千元，公用設備一萬二千元。工作經費，歷史考古組由於要進行考古調查發掘，三萬元；地理及動植物組只有一萬五千元。考察經費雖稱不上十分拮据，但遠遠算不上充裕，緊打緊算的經費預算，也埋下了向達與石璋如、勞榘之間不睦的伏筆。

會議確定四月二十日左右考察團出發，儘管時間非常倉促，仍由中央研究院具銜，向國民政府申報了「採掘古物聲請事項表」，詳細地填寫了率領人及團員的簡歷、調查範圍，在「計畫」項稱：

定為史前、邊塞、敦煌、地理四組，各組注意史前文化之探求；古代國防之設施；東西文化交流以及地理上自然現象。擬先以肅甘〔甘肅〕為中心，並考察寧夏、青海各處古代及現代之一切人文及自然現象，俟材料完畢，再求有系統之報告。²³

稱要調查現代之一切人文及自然現象，目的也是為引起國府的關注，以為調查具有現實的緊迫性。

中央研究院也有公函發往甘肅、寧夏、青海、四川、陝西等省政府及綏靖公署，請求對考察團所經地區及工作地點予以保護和便利。²⁴

雖然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準備之中，但史語所的主事者卻對考察一事憂心重重。會後，石璋如、勞榘將重慶方面的計畫，寫信報告給傅斯年、李濟。二人得知計畫之後，即致信葉企孫、辛樹幟，陳述了對此次考察活動的一些意見，主要討論經費問題：

接石、勞二君函，報告八日開會情形。知西北之行科目、人員均已加多，而經費並未大增，頗與濟前此在渝所聞者異。撰若如此分配，誠恐些些之款，只敷消耗於道路，而成績難期。史蹟一門，尤敢保毫無成就。蓋西北各地，原為物

²³ 〈本所函總辦事處〉（1942.3.21），「31 麻字第 0321.1 號」，附「採掘古物聲請事項表」原稿及抄本各一紙，《史語所檔案》李 38-1-3。

²⁴ 〈本所函總辦事處〉（1942.3.21），「31 麻字第 0321.2 號」文件底稿，《史語所檔案》李 38-1-4。

價高昂省分，而考古部門需款之大。據弟等既往經驗推之，即全數撥歸此門，已感不敷。若分散過多，將各部皆感拮据〔据〕，而成就皆鮮。故濟初定四人，年又主張去一人。且博物院之拾萬元（並非拾壹萬元），係遵理事會議決案，專供燉煌史蹟研究。若移作別用，即無法報銷。而以博物院撥款立場言，尤以搜集標本為重。故弟等之意，此拾萬元仍以全數劃歸史蹟考古為妥。各部門款項，必須劃分清楚，始能各工作計畫不相混淆。至人員、科目之增減，似應視能否另加款項為標準。濟前此在渝所聞，生物、地理組本須於拾伍萬外，另籌經費。今混為一談，似非初議。抑更有進者，燉煌初步考查〔察〕，西人走之已熟，煌煌鉅帙，學人共喻。今茲之行，弟等感覺必須稍有所得。若漢簡及漢唐遺物，能有特殊發現，始免貽笑他人。若仍係試探性質，則西籍具在，展卷可當臥遊，何必捨吾人更重要之工作，空走此一趟哉？弟意如此，不知兄等以為然否？

此事再約言之如下：

- 一、如 兩兄有把握，費用在今年秋季能增加一倍，則 兩兄原計劃可實行。
- 二、如無上項把握，去之後轉成不了之局，史蹟工作，既不能作，又停止石、勞諸人在所之工作，甚屬不值。似應將此組取消，即令二君返所。如何之處，望希 裁復。又會計、文書分工合作，在蘭州以東團體行動時，自屬甚好；至蘭州以西將分途調查，必須各司其事。若仍全體同行，恐彼此牽掣，皆有遷就，似頗不經濟。（圖三）²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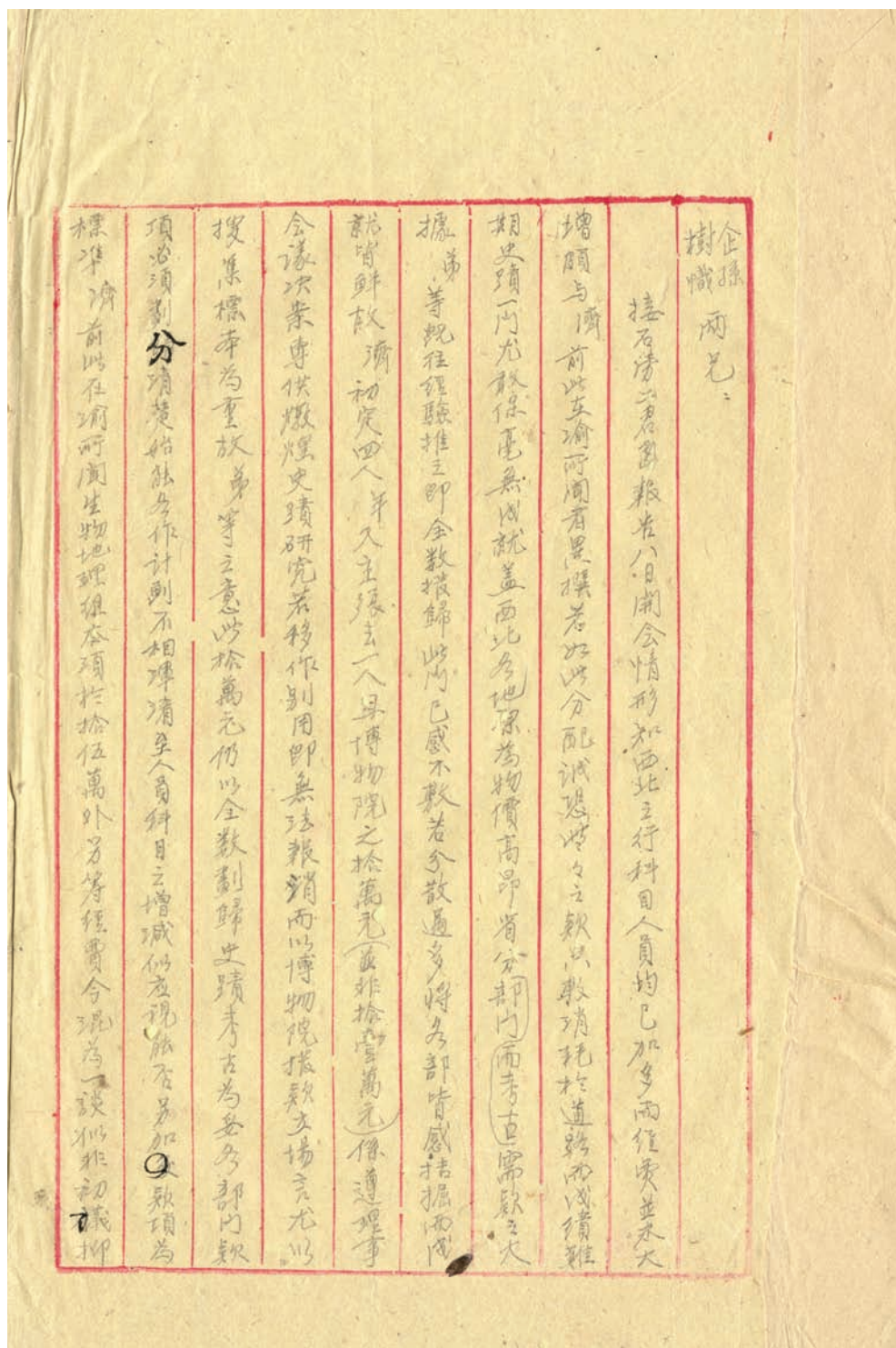
看到這裡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大體眉目，傅斯年、李濟對於西北史地考察團經費不足，深表擔憂。稍有點瞭解的人都知道，在整個人文學科中考古調查發掘，是最費錢的一門學科，它所動用的社會資源更像一個工程。經費不足所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工作質量下降，該做的不能做。更重要的是考察團工作地點，「西人走之已熟，煌煌鉅帙，學人共喻」，西方著名的考古學家、漢學家、探險家斯坦因、伯希和、勒克珂、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 1865-1952），能列出很長一串名字。史語所的學術目標是與西方學界爭取東方學的正宗，²⁶懸的尚高，僅經費一項即已落後他人，貽笑大方的結果，豈可避免？傅、李真正的擔心落在這裡。不能輸在起跑線上，是傅、李二人內心的強烈感受。僅隔一周，傅斯年又去信葉企孫：

²⁵ 〈傅斯年李濟函葉企孫辛樹幟〉（1942.4.15），《史語所檔案》李 38-1-6。

²⁶ 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上冊，頁 25-31。

更有進者燉煌初步考查而人走之已難燉煌之鉅帳字人共喻今茲之行弟等感覺必
須稍有所得若漢簡及漢唐遺物能有特殊發現始免貽笑他人若仍係試探性質
則函籍其在展卷可當卧遊何必捨吾人更重寫之工作空走此一躺哉弟意以此不知
兄等以為然否
此事再約言之如下
一、如兩處有把握費用在今年秋季能增加一倍則兩兄弟計劃可實行
二、如無上項把握去之後將咸陽之局史蹟作既不能作又停止石炭溝人在所方之作
甚屬不值似應將此組取消即令二君返河如何之廢神希
裁後又會計及書分二合件在蘭州以東國條件動時自屬甚好至蘭州以西將分途調查必項
各司其事若仍全俸同行恐彼此牽掣皆有遺憾似頗不經濟外附石炭溝二君函煩轉致
石炭信並附一函專此敘頌
道安
弟斯年
濟
同啟四月十五日

圖三之 2：〈傅斯年李濟函葉企孫辛樹幟〉（1942.4.15）抄件



圖三之 1：〈傅斯年李濟函葉企孫辛樹幟〉（1942.4.15）抄件，《史語所檔案》李 38-1-6。

關於西北調查一事，關於款者另由濟之陳明。……故石、勞之去，乃本所工作中一大攪擾。若其西北之行，有結果可期，當屬值得，今乃知其用此錢數必無結果。²⁷

由此可知上封信是李濟執筆，傅斯年更作「今弟可得言者，即石、勞之行，必一無成績」的決然判斷。不過，傅斯年、李濟的極力反對並沒有影響中央研究院上層的決策。這樣，石璋如與勞榦在高層並無共識的情況下，踏上了艱難的考察之路，時間是一九四二年的四月一日。

三、向達來遲了

石、勞出發前，傅斯年、李濟曾致電向達，向達回電稱，五月中會赴李莊。²⁸橫亙在向達面前的障礙有兩個：一是經費；第二是交通。

其實，向達家眷一直是困擾他西行的難題，早在一年前在給傅斯年的信中談到這一憂慮：

目前達所顧慮者，內人小兒輩俱在此間，乏人照料，如去西北，非將彼等送回湖南不可，而路途遼遠，盤川之資，所儲萬不足以應此需。

向達能想出的辦法，也不過是一般讀書人都能想見的，「擬將行笈所有書籍鈔本出售，或抵押三千元，使家人輩回里有資，凍餒無虞，庶幾彼時可以輕身就道，一意孤征」。²⁹並委託湯用彤先生代為商洽轉讓事宜，希望能儘快有眉目。傅斯年聽了向達打算後，寬慰道：

既準備此行，則不免安排家事，寶眷是否擬送往湖南？果作此計，不免有所費，假如有現成稿子，可賣給史語所（以前此例極少），此時生活之事實如此，不能不達變通耳；或以書轉讓，均無不可。吾輩同行皆落難者，故直陳之，當不怪也。

以清廉和不徇私情自持的傅斯年，話說到這個份上，已相當罕見，傅斯年身段柔軟的另一面由此得以呈現。並另出主意，「其實家眷往西北亦無不可，但太遠耳」。³⁰雖有傅斯年的網開一面和湯用彤的居間協調，一年來，向達的困難仍未獲得解決，沒能如期抵達史語所的所在地成都李莊。

²⁷ 〈傅斯年函葉企孫〉，《史語所檔案》李 38-1-7。

²⁸ 〈向達電傅斯年李濟〉，《史語所檔案》李 38-2-10；《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 415。

²⁹ 〈向達函傅斯年〉（1941.5.10），《史語所檔案》李 14-28-3；《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 413。

³⁰ 〈傅斯年函向達〉（1941.11.8），《史語所檔案》李 14-28-2；《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 414-415。

大家都知道，民國時期教授薪資充裕，生活優渥，衣食無憂則更不必道及。不過，日本人的入侵，打破中國人健體強國的美夢，經濟狀況也隨即急轉直下。物價一改近二十年的平穩水準，開始了長達十年的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薩孟武回憶了當時的米價和薪水的關係：

抗戰到了第三年，通貨膨脹，物價亦隨之踊貴。初到四川之時，一擔米不過六七元，漸漸提高，高到二十元一擔了。俄而又高到三十元、四十元、五十元……一擔了。大家都感覺經濟困難，常向學校預支薪水，到了發薪水之時，每人所得的紙袋（內存薪水）都是薄薄的幾張法幣，倘有一人收到很厚的紙袋，別人反認為怪事，該人亦必多方解釋，總之，抗戰時期，貧窮是原則，而富裕則為例外。³¹

一九四一年底當一擔米漲至二百多元以後，向達每月四百元的薪水，顯然不足以應付一家人的生活，更遑論長途遷徙。在西南聯大賣藏書以解燃眉之急者遠非向達一人，吳晗被迫將有關明史的藏書轉讓於雲南大學圖書館，大哭一場。法學家費青為治病，只能將珍藏的德、英和中文圖書悉數折售於北大法律研究所，得三千元。³²多方籌措之後的向達，終於可以拖家帶口的前往李莊了。

以現在昆明往成都道路的順暢，很難想像七十年前的旅途。恰巧，語言學家羅常培，一九四一年五至八月間，由西南聯大所在地的昆明前往四川公幹，飽嘗了當時蜀道的艱難：

所用的交通工具一共有九種：最進步的是飛機，最原始的是雞公車，介乎兩者之間的還有小汽車、木炭汽車、酒精卡車、輪船、柏木車、黃包車、滑杆等等。行期的大部分都耗費在等車、候船，汽車拋錨，山洪沖斷公路……許多想不到的事情上面。³³

公差尚且如此，傾家而行的向達連汽車也找不到：

五月下旬即決定將全家送至李莊。唯近來赴瀘車輛極其困難。五月間到處托人找車，俱無辦法。六月初旬以後，由袁希淵、湯錫予兩先生介紹新綏公司，復經半月之奔走，至今漸有眉目。今日接洽結果，謂七月一日有車赴瀘，明日下午再往接頭，即可決定。如無其他意外，大約一日可成行，則七月中旬或可抵李矣。³⁴

³¹ 薩孟武，《中年時代》（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96-97。

³² 參見陳明遠，《文化人與錢》（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頁209-210。

³³ 羅常培，《蒼洱之間》（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頁7。

³⁴ 〈向達函傅斯年李濟〉，《史語所檔案》李38-2-15；《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415。

事情並不像向達預計的那樣順利，一家人並未如期起程。好不容易上了汽車，卻在中途拋錨。當時，由昆明去李莊，先到四川西南、長江北岸的瀘州。史語所由昆明遷往李莊，就走的這條路，第一天住曲靖，第二天宣武，第三天住黑石頭或赫章，在山區。第四天住威寧，通常會休息一天。第六天住畢節，第七天住敘永，然後再到蘭田壩。³⁵七月六日向達才到蘭田壩，並向傅斯年發一封電報，報告抵達瀘州。³⁶從蘭田壩上船，經水路到宜賓，再換小船到木魚石。木魚石邊上就是李莊，向達一家千辛萬苦終於在八月中旬方才到達李莊。³⁷比預算的時日又晚了一個月。家眷匆忙間被安置在李莊附近，見過傅斯年、李濟等人後，向達向史語所借了幾本書、地圖，急切地踏上了西行之路。

四、敦煌來信

從向達西行的第一天起，就有信給曾昭燏，詳盡地報告旅途見聞、考察所得。剛開始幾乎每隔三、四天，後來通信的頻次延為一週，一九四二年九月至一九四三年五月間，二十九封向達來信，曾昭燏完整的保留下來，成為瞭解考察活動的珍貴材料。³⁸

這裡照錄一札：

昭燏先生左右：廿二日在渝曾發一函，想荷答及。廿三日因飛機未能起飛，耽擱一日，遂往訪大綱兄，縱談甚歡。晚間同大綱兄往謁其太夫人，並見到令妹，候大維先生未歸，悵然而返。廿四日仍未能成行，連日陰雨，無聊之至。廿五日午刻，始自渝起飛，下午四時，安抵蘭州，堪以告慰。自上空下窺，甘蜀兩省，似以秦嶺為其大限。蜀省重嶺疊嶂，青翠撲人；一入甘境，便是黃土地帶，儼然塞外風光。蘭州城外，滿目荒涼，城內市容，甚為整潔。中山先生以蘭州為沿海區與內陸區之交點，誠有所見也。此地水果絕佳，菜蔬亦好，冬季與北平不相上下。在平時不失為一居住佳地，唯近來物價上漲，與重慶不過伯仲之間，未免有居大不易之感耳。勞、石二君有信來，敦煌工作大致告一段落，留抄題記一事，待達結束。彼等折往居延，從事發掘。二君盛意，頗可感

³⁵ 參見石璋如口述，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訪問，《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224-231。

³⁶ 〈向達電傅斯年〉，《史語所檔案》李38-2-1。〈向達電傅斯年李濟〉，《史語所檔案》李38-2-13（又見《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416），唯檔案號與原件不同。

³⁷ 向達，〈西征小記〉，《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頁338。

³⁸ 這批信件原以〈敦煌通信〉為名，刊南京師範學院編，《文教資料簡報》11/12（1980）：1-58；後收入《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372-412。

激。達擬在此稍稍準備過冬用具，並參觀私人所藏敦煌遺物及附近古迹，然後西行，獨遊河西一帶，至敦煌留月餘日，即行東歸。所注重者，仍在將來考古工作之可能程度，以及工作站地點之選擇諸項，希望於此等事能稍獻芻蕘。若云發見，則只有另待高明矣。不識 左右將何以教我？達西行之期，大約在十月初，到敦煌恐須在十月下旬，如荷 賜教，請徑寄甘肅敦煌轉千佛洞達收。航快半月可到，平信則不知何日矣。孟真先生處，稍遲當去函告知一切，見到時便乞先為致聲，感荷感荷。率陳，不盡所懷，即頌

著安

向達載拜上自蘭州

九月廿六夜³⁹

剛開始，向達的地理、地貌描述占去了相當的篇幅，從甘、蜀兩省地貌上的區隔，到西北所謂的裡外之分、驛路及道旁的參天左公柳，均有涉及。後來主要談及學術，關於學術考察的主要收穫，除在信中匯報外都寫進了他的〈西征小記〉及其他論文之中，榮新江教授亦有很好的總結，此不贅述。⁴⁰

向達也透過他的觀察，瞭解了許多民衆生活，物價事關本人吃飯，是他關心的重點之一，上引信中稱蘭州「在平時不失為一居住佳地，唯近來物價上漲，與重慶不過伯仲之間，未免有居之大不易之感耳」。十月三日信中寫道：

至於西北窮苦，並不如傳言之甚。武威、張掖生活低廉（米斤三元，麵一元半，肉三元，羊肉二元）。……酒泉生活較高，以視蘭州、四川尚遠不及。就生活而論，誠避秦之桃源也。⁴¹

唯酒泉市面不如張掖，更不及武威，而物價之高，不止一倍（武威、張掖米每斤三元左右，肉三元，羊肉二元；酒泉六、七元，肉六元，日用諸物，比武威、張掖俱貴）。……玉門所產汽油，官價三十元一加侖，煤油約一百元左右一桶。⁴²

戰爭的陰霾很快蔓延至西北，糧食由政府統購。糧食上漲更波及向達的生活：

敦煌近因徵購糧食，市麵粉小麥頓形短缺，屬為未雨綢繆。因即托其設法購存小麥一石，以備緩急（此間麥價每石五百六、七十元至六百元，重四百斤）。⁴³

³⁹ 〈向達致曾昭燏信〉（1942.9.26），《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374。

⁴⁰ 向達，〈西征小記——瓜州談往之一〉，《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頁337-372；另參見榮新江，〈驚沙撼大漠——向達的敦煌考察及其學術意義〉，頁104-105。

⁴¹ 〈向達致曾昭燏信〉（1942.10.3），《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376。

⁴² 〈向達致曾昭燏信〉（1942.10.7），《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376。

⁴³ 〈向達致李濟、傅斯年書〉（1942.11.5），《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384。

第二年的四月份，向達除麵外，幾乎無菜可食。

敦煌自限價以後，百物絕，肉久已無市（黑市每斤廿餘元，油每斤卅餘元，亦甚少）。牛羊肉偶爾一見，亦轉瞬即盡。麵粉限價三元一斤，黑市六元亦無購處。……無肉尚可，唯白菜、蘿蔔亦絕，此則不了也。⁴⁴

向達套用陳夢家夫人趙蘿蕤一句話，趣稱「一日三餐麵又麵，條兒麵和片兒麵」。⁴⁵

冷凍，對向達一個南方人來說，比食物的單調更讓人刻骨銘心。十二月初冬剛至，向達就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天氣尚不甚冷，今晨至攝氏零下五度，手足微感僵痛。日間陽光甚佳，約在四、五度之間，洞中抄錄等等，可以無礙。唯在蘭時以攜款不，向科學教育館借一出差用老羊皮大氅，太薄而又破舊不堪，不足以禦嚴冬，不日渝款匯到，擬在此另購一件，即可高枕無憂。足下有氈窩子，在零下三、四度尚行所無事。頭上曾購韃子帽一頂，上綴貂尾。⁴⁶

敦煌的嚴冬，零下二十幾度的低溫伴著刺骨的寒風，沒有老羊皮襖根本不足以抵禦寒冷。這種老羊皮襖，是用多年生大羊長毛厚皮製成，重達三十多斤，石璋如對如何正確使用，有過精彩的描述：

老羊皮襖穿在身上比人的身高還要長，要是不先折起束腰，就會拖在地上。睡覺時就要反穿老羊皮襖，袖子用繩子綁起成為褲子，扣起釦子，衣襟部分留一小縫隙呼吸，人就包在大皮襖裡，羊皮毛很長，越吹風越暖和。⁴⁷

勞榦有一張龜縮在老羊皮襖中的照片，凜冽寒風中只露一臉。⁴⁸（圖四）向達缺少的正是這樣的老羊皮襖。燃料困難，室內生火成了一大問題。白天尚可在後院太陽下寫信，以搏溫暖。晚間則筆墨俱凍成冰，完全無法工作。木柴在敦煌即使有錢，也無從購置。畫家張大千，財力雄厚，自備駱駝，從百里、二百里以外的地方馱運，⁴⁹向達無法辦到，只得忍受。

儘管向達在敦煌遇到了很大的麻煩，貧寒交加，不過，他樂觀的生活態度，使無聊而艱困的日子憑添幾分樂趣。他頭上戴的韃子帽：

上綴貂尾，迎風飄蕩，頗為有致。入城時戴此，敦煌城風頭，幾為區區個人出盡。日昨同住之江西盧君不服，亦購一頂，於是遂成平分秋色局面。⁵⁰

⁴⁴ 〈向達致曾昭燏信〉（1943.4.1），《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403。

⁴⁵ 〈向達致曾昭燏信〉（1942.12.4），《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385。

⁴⁶ 〈向達致曾昭燏信〉（1942.12.4），《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385。

⁴⁷ 參見石璋如口述，陳存恭等訪問，《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頁269。

⁴⁸ 參見邢義田，〈行役尚未已 日暮居延城——勞榦先生的漢簡因緣〉，《古今論衡》8（2002）：42。

⁴⁹ 〈向達致曾昭燏信〉（1943.1.2），《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387。

⁵⁰ 〈向達致曾昭燏信〉（1942.12.4），《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385。



圖四：一九四二年，勞榘在小方城調查，石璋如攝。
(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他戲謔稱：「去歲如經濟充裕，則養尊處優，何從有機會受室內攝氏零下廿二度之訓練，自亦無從有今日之一副頑軀」。⁵¹並以曾國藩教人紮硬寨，打死仗；陽氣愈提則愈盛，精神愈用則愈出的格言激勵自身。⁵²說來向達的身體也很爭氣，只有剛到西北在蘭州曾有過一次傷風，以後數月連感冒也不曾有過。一次騎馬從大方盤城疾馳一百六十餘里至敦煌，同行士兵下馬時腿腳俱軟，向達則所行無事。

即使在那樣的環境中，向達書信文字優雅而整潔，他那唐人寫經般的字體，仍然能作到一筆不苟。(圖五)偶而會有錯字，竟然在下封去信中加以修改。十月七日致曾昭燏信的末尾，向達又注：「四日所發函中，『彌覺淒楚』，『彌』誤書作『靡』。見笑大方，慚愧慚愧！」⁵³到了滴水成冰的季節，仍會呵凍作書，有「煙甚，書不成字，羞煞人，羞煞人」⁵⁴的附記。

五、與石、勞二人交惡

如果我們仔細地閱讀一下向達在敦煌的全部通信，就會清楚地發現困惑和難題，徹底貫穿著他西北考察的全部過程。即使當他考察活動有些成績時，痛苦並未隨之減弱，相反，另外的苦惱，卻悄然無息地接踵而至。人事矛盾糾葛正是向達深感沮喪不已的地方。我們雖無意於評判先輩學者之間的是非，但雙方當事人的說法大相逕庭，瞭解他們之間的內心想法，則有助於更全面地評價西北史地考察團的全部成果。

⁵¹ 〈向達致曾昭燏信〉(1943.4.25)，《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405。

⁵² 〈向達致曾昭燏信〉(1943.1.2)，《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387。

⁵³ 〈向達致曾昭燏信〉(1942.10.7)，《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377。

⁵⁴ 〈向達致曾昭燏信〉(1943.1.13)，《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389。

昭痛先生侍在廿四日重遊西關歸未得讀三月廿二廿九兩次賜教並承鈔
示索數碑及書札奉表感荷元既閱於杜著小記家為改正敬此謝之並望三
室感通錄試查昭痛和法家格月最當可知其在大正藏何部沙州墨藝一段缺
者為季子千仙洞北口東有一亭四月八日備有茶水以供進香者之用並懸一
鐘聲聞教里行戈壁者於此可以不致迷途故其地為茶亭子如杜著家
四時致意望明為幸 西北工作

三下教數南示以國家學術為言 達忠誠能不感奮唯達之所以不欲
為此者實無干而個人實有不能也今仍守以前諾言俾作民到此
助三指工作詎成立後復再圖實行個人所擬對於河西祇在中國古代仙教
藝術造蹟作一整個敘察之計畫畫張大千五月初離教赴萬仙峽達大山二
於此時去後望一星期五月中旬返教將千仙洞工作整理結束 張大千已寄到抵
再作他計

三下仙云返川一介 甚望 達已於今日電張先一並請於六月間赴渝面
商一切求其復示大約在六月下旬或七月初必可呈渝 然後赴李錫傳李
諸公恭聆訓誨是時仍望

三下能痛予開手也 達下忘已於今日去電命其還梁山如有困難則 暫時
赴渝居以待填兒輩上學以及照料 俟而無大問題 在下承蒙
閣下兄輩後旁督教真所謂古語入求之今日酬及望後可得此情不
有永銘五內對於達下及兒輩 唯恐

三下訓誨之不曉督教之不嚴古人易方而教即是此意達及人尚明理
三下不必怨、達惠也小兒進進空軍幼年學校似不相宜因其欲職不有性情
大字學空軍只有出札子不如進一好中學而可期望成材而能進南開中學自
然最好遷居沙坪壩二即為此達已另函達下將來如遷渝或即與凌劉二家
同片傳心后信之誼殊不可忘已作函敬謝長北大興博物院研院啟

圖五之 1：〈向達致曾昭燏信〉（1943.4.25），收入《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 405。

在六月二十二日的第七號報告中，石、勞敘述抵敦煌的情形和工作安排：

十七日午後自城內出發，多經沙磧，車行甚緩，次晨（十八日）達到千佛洞。
千佛洞共有兩喇嘛廟一道士廟；喇嘛廟稱為上寺及中寺，道士廟即著名王道士
所曾居者，稱為下寺。璋如及幹住在中寺，張大千則在上寺，教部藝術團，亦
在中寺。張大千雇有喇嘛能畫者及畫匠八九人，大批臨摹。藝術團僅來三人臨
摹，聞藝術團準備住二、三月，張大千則無限期也。

敦煌壁畫始自北朝終於元代。從題識及殘存有層次者推斷，大致可以決定。蓋
用筆及著色均有不同，比附觀之甚為明顯。尤以北朝及唐代之鴻溝更為顯著。

此或因隋氏平陳以後，南士多來雍洛，當時經學書法趨尚南朝，繪畫應亦受其影響也。現在北朝繪畫片楮不存，則敦煌壁畫可稱瑰寶。

現在之工作為第一步測量一準確之千佛洞全圖。現在對每洞之結構均詳加測量，蓋此項工作素無人做。伯希和之圖亦非常簡陋，不足以為科學上之根據。其他諸人更不足論。至於伯希和之照像，所注重者似只有題記一項，並無若何道理，可補充者甚多。至於紀錄一項擬分為洞內結構、塑像、壁畫（佛教故事及圖案），對每洞之特點各作一詳細紀錄，然後再作一比較，從各部分之特點，斷定其時代及其對於歷史之關係。⁵⁷



圖六：一九四二年，石璋如調查敦煌，在千佛洞中寺住所前與同行的勞貞一合影。（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石璋如、勞榘在莫高窟的具體分工是：勞榘抄錄壁畫上的題記；石璋如則測量整個窟區平面圖和每個洞窟的平剖面圖，兩人都有拍照工作。照像的原則是伯希和以前未照者，共照有四十多卷。記錄按每窟的結構、塑像、壁畫等內容，每窟一頁，約有三百餘頁。一般來說學術界對於石、勞二人的莫高窟調查工作，給予充分肯定，認為是此次西北考察最重要的成果。傅斯年、李濟看了石璋如帶回的測繪圖、照片，非常高興，大獲二人的讚賞。⁵⁸從五十多年後，石璋如出版的三巨冊《莫高窟形》⁵⁹來看，無疑代表著一個時代較高的水準。

本來向達與石、勞二人有著良好的互動，向達在致傅斯年、李濟信中稱：「璋如、貞一兩兄抵敦煌後，曾來一電，達復電盼於七月能啟程赴甘云云」。⁶⁰九月末，石、勞二人的莫高窟調查基本結束，正值玉門油礦局敦煌辦事處撤銷，為趕得上玉門油礦局接人的最後一次班車，二人於九月二十二日離開，前往居延考察。這時的向達才剛到蘭州。石、勞在給傅斯年、李濟的信中也提及向達到來事宜：

至於向先生來燉未成問題。早已與陳縣長說妥，而且藝文考察團盧善群尚在千佛洞，與中寺喇嘛相處甚好，故食宿及其之〔它〕一切不成問題。不過千佛洞開始冷了，早晚均須棉衣。陰曆九月底即凍冷。若再遲，來年恐不能工作。⁶¹

⁵⁷ 邢義田，〈行役尚未已 日暮居延城——勞榘先生的漢簡因緣〉，頁 50，又此信見《史語所檔案》李 38-3-8。

⁵⁸ 同上註。

⁵⁹ 石璋如，《莫高窟形》（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6）。

⁶⁰ 〈向達函傅斯年李濟〉（1942.6.29），《史語所檔案》李 38-2-15；〈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 415。

⁶¹ 邢義田，〈行役尚未已 日暮居延城——勞榘先生的漢簡因緣〉，頁 54；〈勞榘石璋如函傅斯年李濟〉（1942.9.26），《史語所檔案》李 38-3-10。

向達十月一日搭乘順車到武威，有信給傅斯年、李濟：

孟真、濟之兩先生侍右：

抵渝後曾上一函，想達記室矣。廿五日自渝起飛，下午四時安抵蘭州，即往蘭州招待所，從科學教育館得到轉來貞一、璋如二兄九月八日函電，謂擬於半月內結束敦煌工作，然後折往酒泉，轉赴居延。屬達到蘭後，逕趨敦煌，將題記抄畢，以告段落云云。預計勞、石二兄敦煌工作結束之日，正達到蘭之時。如無便車，火車至酒泉須六七日，至酒泉後稍事準備，然後出發，當在十月初旬。此間水利林牧公司總經理沈君怡先生因事赴河西一帶考察，今日自蘭出發，達附乘其車，夜宿武威，明日停一日；三日至張掖，停一日；五日至酒泉，極盼到酒泉時，勞、石二兄尚未北行，可與會合，同赴居延一帶。萬一彼等已先期啓程，達只有仍乘原車西行至敦煌，結束一切工作。究竟如何進止，俟到酒泉後當再上聞。匆匆不盡，即頌

道安

後學向達謹啓 十月一日上於武威旅次⁶²

當向達十月五日趕到酒泉時，石璋如、勞榦已遠赴居延，他們擦肩而過。

雖然表面時間不可重合，我們並不一定非要認定是精心設計的結果。但遺留給向達的工作內容，卻有點蹊蹺，向達是要抄錄莫高窟題記，同樣的工作勞榦卻已經幹了二個多月。這樣說來石、勞二人避開與向達同行，已有心證。嘴上雖不說，但對於十月初才匆匆趕到的向達並不以為然，天氣漸冷，再遲工作只好待來年的說法，就是註腳。

剛開始，石璋如、勞榦並不是向達攻擊的對象，隨著天氣變冷，向達逐漸陷入困境。經費不足顯然是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向達並非田野考古學家，加之匆忙趕路，田野考察的所需物品，從行頭到文具都準備不足，甚至連最基本的鉛筆都沒有。⁶³等發現問題，已經來不及，因為敦煌是個有錢也買不到東西的地方。或許向達覺得此類事應該統一準備、使用，石、勞認為各自購買裝備用具應屬常識，他們雖有文書、會計之名，用石璋如的話說：「因此所謂會計、文書只不過是個人之間換錢等類的事情罷了」。⁶⁴並無其他職責。漸漸地，石、勞二人在向達的筆下成了品質惡劣的化身，不滿的頻次加大，與以前的幾筆掠過不同，有時著墨甚多。

⁶² 〈向達函傅斯年李濟〉（1942.10.1），《史語所檔案》李 38-2-8，《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 418。

⁶³ 〈向達致曾昭燏信〉（1943.3.20），《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 400。

⁶⁴ 參見石璋如口述，陳存恭等訪問，《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頁 250。

糾紛的不斷延燒，也波及到數千里之外的李莊，身兼領導及朋友幾重角色的曾昭燏，被捲進漩渦之中。她一方面去信安慰向達；一方面在史語所據理力爭，希望能替向達討回公道。

即使如此，向達的困局並未得以破解，他用精妙的文字來比喻眼前情形：

至於達今日之情形，大似蒙主人厚意相招，在人家作客幫閑。主人事忙，無暇照料，一切托諸管事。管事不體主人之意，始則薦以草具，漸乃三餐不繼。作客者無可如何，只能作種種暗示，暗示無效，乃向主人婉辭求退。而管事者對人曰：某某何必客氣！無飯無錢，向吾輩說可耳。世能有如此忝職誣罔之管事，絕不可有如此厚顏之客人。⁶⁵

向達以退為進向朱家驊院長提出，希望退出考察，朱一面電慰；一面讓王敬禮電匯五千元。⁶⁶向達於十二月份輾轉收到此款。

驚動上層之後，此事也引起傅斯年、李濟的關注，他們命石璋如、勞榘二人就整個事件寫出一份詳盡報告。在史語所《傅斯年檔案》中存有這份報告的原件，包括工作與款項兩部分，從筆跡上看前者是勞榘執筆；後者由石璋如撰寫。現不避冗長，基本全文照錄：

關於工作者：

章如及榘於三十一年四月一日自李莊出發，在重慶、蘭州均曾寫一信寄向先生，在敦煌曾發一電並寫二信。後接向先生一電云七月中可出發，又接一信云八月中可來敦煌。章如等即待至九月二十一日，時敦煌工作已大致完畢，亦並未接到向先生起身函電。是時已屆深秋，原定本年內赴居延，「胡天八月即飛雪」再晚便不能去。適有油礦局便車自敦煌至酒泉，故即前赴酒泉，但又恐向先生已起身，故又以航函電蘭州科學館留交向先生，告以已起身。又對酒泉測候所主任李君，亦告以請其轉告向先生，章如等月內準返酒泉。因此，十月一日便從酒泉出發赴居延。十月二十一日回程過鼎新縣，始接縣政府轉到向先生來信，（按：信上緣加說明「向先生之信中並未提及需款事。」）知向先生已過酒泉，來不及相見矣。本擬即赴敦煌，但交通工具十分不便，章如等回酒泉係乘油礦局便車，向先生亦係坐林牧公司小車赴敦煌，均是臨時機會，不易湊巧也。章如等待車至十一月十六日自酒泉出發，回蘭州時汽車又沿途拋錨，消息不通，十二月十六日始到蘭州，向先生處一切情形竟無從知曉也。

⁶⁵ 〈向達致曾昭燏信〉（1943.3.20），《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399。

⁶⁶ 〈王敬禮函傅斯年〉（1943.1.2），《史語所檔案》李38-1-11；〈王敬禮電袁翰青〉（1942.12.10），《史語所檔案》李38-1-10。

關於款項者：

在向先生未動身之前，幹及章如共領購置旅費、工作費等為六萬五千元（博物院代購用品費一萬元除外）。故全部工作費中大半存渝，以便向先生自領。又因酒泉為飛機場，故存測候所胡振鐸處壹萬元，以備全人隨時取用。

十月三日（大概在向先生動身之後），由渝匯出五萬元，四萬元匯蘭州科學教育館袁翰青館長，科學館用該館名義存行，另一萬元匯酒泉測候所張益三主任，即託測候所用該機關存行，以便分別取用。因章如在旅途中，恐用章如私人名義存行，以致向先生到達時支用不便也。

十月廿一日我等在鼎新接向先生由酒泉來信，言五日到肅即西上。我等二十七日返酒泉，因候車停留三星期。十一月間在酒泉接向先生由敦煌來信，略謂明年一月可竣工東返。當時因渝、蘭兩處均有款存放，向先生過酒泉時，此二萬元又未動用，意向先生定攜有款項。向來信又從未提及款事也。

本團總幹事李承三先生因病於十月間返川。十一月五日接重慶院方來電，囑留甘，明年仍繼續工作，同人遂作留甘之計劃。

赴居延時曾用去酒泉存款一部。東返旅費須一部，尚有一萬元用不著，仍由張主任名義存放。章如即函向先生，略謂：「此間尚餘款一萬元，明年仍須來此工作，擬存此間，先生款若不夠用時，請動用」（信之原文記不清楚，大意如此）。此時先後領款已十一萬五千元，而蘭州存四萬元，酒泉存一萬元均未動用。

十一月十六日由酒泉東返，車壞甘州途上，停留二十餘日，至十二月中旬始返蘭州。至科學教育館，袁館長告知「向先生最近需款」。即托該館代匯，匯款條子業已繕就，即將赴銀行時忽接總辦事處電，略謂：「款已匯出，尊處款請勿再匯」。遂止（原電附入）。

時曾略計存渝兩萬五千元（應為三萬五但扣除博物院代購用品一萬元，故約餘此數），又匯出五千，酒泉又存壹萬元，想向先生一時不致無款用。

……向先生始終未寫信提及款事，亦不在蘭州用款，故不知向先生在敦甚窘，章如之通信處預定為漢中西北大學。因在邠工作過久，未能早達。一切消息皆甚隔膜。至四月間由西安接李濟之先生信，始知向先生因款關係對章如不滿。即快函分詢蘭州袁館長、酒泉張主任，均覆以款仍未動，無人領取。此時乃知章如不善處世，不善會計而得罪向先生也。^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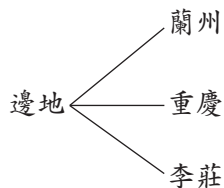
① 〈石璋如勞幹函〉，《史語所檔案》李 38-3-22。

走筆此處，向達與石璋如、勞榘雙方的意見我們大體清楚，其中的是非曲直或許我們仍然不能獲得明確的判斷。然而，他們在敦煌調查中所取得的成績卻提醒我們，前輩學者所面臨的困難也許要比現在人想像複雜得多。儘管我們非常願意相信向達敘述的個人遭遇，完全是不帶有任何偏見的事實。

向達與石璋如、勞榘都有和傅斯年、李濟報告考察工作和學術上的具體收穫；曾昭燏也向傅、李二人轉達過向達的若干抱怨，以傅斯年大公無私的性格，並不會偏袒任何一方，尤其是自己的屬下。但向達與石璋如、勞榘交惡的事實，確使傅、李為難，以公的立場，他們不便干涉考察團事務，在私來說他們與向達有賓主之誼。向達、石璋如、勞榘傾訴的對象都是第三方，其中並不見考察團組織的任何蹤影。暴露出倉促組成考察團，根本沒有發揮出組織協調作用，形同虛設。團長辛樹幟並未去西北，先是去湖南，後來又遠赴福建，真可謂南轅北轍，完全沒有董理考察團事務。向達雖為組長，石璋如、勞榘的行蹤卻從未向組長報告，總幹事處給石、勞二人信件，交由向達轉交，向達不知二人蹤跡，只好退回給總幹事處。石璋如超越原計畫的陝甘調查，也被院本部毫無理由的批准。傅斯年對考察團的評價是：「即此團毫無組織是也，在此情形下，難期望達到何等學術目的也」。混亂無序的管理，實為考察團成員間不睦的誘因，無論如何傅斯年不能袖手坐等其亂。三思之下傅斯年給朱家驊院長寫了一封長信，闡述他對考察團繼續工作的進一步思路：

一、組織的連繫

- 1、如有團長，便應名符其實，駐在蘭州不能動，俾辦理各事。如其各組各自為政，則即以總幹事為團長，在重慶辦理各組之連繫、報帳等等事務。但蘭州方面，似不可不有人住，以便隨時請護照、派兵保護、車輛等事。若無人可派，或目下工作太少，不必多費，即託吾兄，請一在蘭熟識之人，給一名譽職，代辦此事，足矣。庶幾電信無往返抗〔耽〕擱之虞也。（因如真正做起來，與甘省府接洽各事，必多也。）再簡言之，蘭州必有人，一事也。重慶必以總幹事兼總持事務，庶幾事無停滯，二事也。此就全團言之也。
- 2、就史地組言，史不知地，地不知史，非謂我等無地理常識也，人不相識耳。故必宜分開，各自成組，各負責任。
- 3、在李莊必有人負責，俾出發各人之消息，時時可知。總辦事處亦應時時供給。此事，弟絕不能擔任，因弟身體如此，應如老子所云「損之又損，以至于無」也。此事自當由濟之辦，若濟之太忙，或託曾昭燏君為此組秘書，亦可。曾女士乃中央博物院之專員，與覺明及考古組諸人均好，又為濟之所識任也。如上所述則：



辦事中皆可不空塞，而每處有指定之人負責，事務自無今日之現象矣。

二、學術的聯繫（此專指史學一組言）

1、院中諸人出去，當先有計畫，其進展之情形，當時時聞之，而歸來有報告。如此方可時時探討下一步之辦法，（覺明每月必有詳信寄曾女士，故此間知其情況最悉。）即如吾兄熱心之燉煌，下一步應如何辦？一面當給覺明以全權，一面此間重慶、李莊亦應有主持之人。譬如覺明要挖千佛塔，許之乎？如許之，錢有著落乎？故弟意應由院中明託企孫兄與濟之兄負責主持其事。

2、史學一組，其主任應由覺明爲之，他人須聽其調度。添人應得其同意。或者史前考古宜另辦，則另作爲一分組可耳。⁶⁸

傅斯年知人鑒事目光如炬，他仔細入微地分析了考察團目下亂象的根源，針對這些弊端提出了完整的解決方案。方案中種種情況都加以預設，在擬實行措施中方方面面都照顧周全，尤其向達的地位獲得了極大肯定。有理有節，如學術聯繫僅限於歷史一組。實際上第一次西北考察尚未結束，下次的考察活動已在醞釀之中。第二次西北科學考察的成功，傅斯年的居間協調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六、西北工作站

向達到達敦煌後不久，很快就注意到，所謂的西北考察活動，非要有專門的田野考古學家的參與而不能藏事，而他本人卻沒有這方面訓練：

達於西北史地，只因治交通史偶然涉獵，並未下過功夫，於考古尤其外行。致騷先先生函所謂「搜奇有心，濟勝無具」，即是此意。⁶⁹

三、四兩月，兩游其地，亦只徘徊憑弔，不敢妄動鋤鋤，因自知於發掘全無訓練，率爾從事，徒然損壞遺迹，見識識者，而於學術曾無補益也（斯坦因之譏橋瑞超，可爲殷鑒）。⁷⁰

⁶⁸ 〈傅斯年函朱家驊〉（1943.1.15）抄本，《史語所檔案》李 38-1-12。

⁶⁹ 〈向達致曾昭燏信〉（1943.3.2），《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 394。

⁷⁰ 〈向達致曾昭燏信〉（1943.5.9），《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 407。

急切地盼望夏鼐加盟，所流露出的興奮和期待，一直持續到與曾昭燏通信的結束。夏鼐幾乎成為向、曾二人唯一的話題，向達圍繞著夏鼐的到來在準備一切，甚至專門寫了一紙〈西北旅行須知〉，請曾昭燏轉給夏鼐。與此同時，向達也發現要進行長期考古工作，必須有一工作基地，作為保障。張大千破壞壁畫行為，更使他感到痛心疾首，為此他專門撰寫一長文，透過傅斯年推薦發表在《大公報》上。向達的文章沉著鎮定，並不像現實中那樣衝動牢騷滿腹，通過嚴謹的論述揭露張大千的行徑，憤怒的火焰被暫時壓下。向達以呼籲在敦煌建立科學管理機構的構想來結束這篇文章：

所以我的最後一個建議是盼望國立學術機關，能在河西選擇一適中的地點設立工作站，工作站的範圍，或者可以偏重於歷史考古方面，財力人力如其可以兼顧的話，還可以從事於地理、氣象、地質、森林、人類學各方面的調查與研究。^①

向達這項有意義的建議，獲得學術上層積極的正面回應，湯用彤來信稱，北京大學有與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合作，在西北設立歷史考古工作站意向。朱家驊院長也讓向達擬寫一份西北工作站的詳細計畫。不過，向達覺得：

自思於考古既是外行，於野外工作又毫無經驗，豈可妄有所論，見笑通人。故覆濟之、孟真兩先生函，於此只願就個人所知，聊貢芻蕘；至於正式計劃之擬定，最好出自孟真、濟之兩先生之手，或由作民負責，亦無不可。^②

對於有人認為應由向達主持西北工作站，向達並不以為自己是合適角色，無作領頭人的才幹，只能跑跑龍套，敲敲邊鼓，湊湊熱鬧，一旦為「長」，粉墨登場，便手足無措。向達以夏鼐不唯考古學非常出色，更於史學、人類學及其相關各部門，亦有相當修養，推薦主持最為適宜。^③

傅斯年對於設立西北工作站的倡議，最初並未十分熱心和積極回應，但隨著他與陶孟和爭執的升溫，傅忽然覺得西北工作站是一發十分合用的炮彈。

簡而言之，一九四二年八月蔣介石視察西北後，提出「西南是抗戰根據地，西北是建國的根據地」的口號。時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簡稱社會所）所長的陶孟和，響應號召，擬就了將社會所遷往蘭州的計畫，請蔣廷黻轉呈蔣介石。不料蔣介石同意西遷，卻批示社會所要遷往蘭州以西的地方。原本陶孟和的如意算盤是社會所

① 向達，〈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後收入《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322。

② 〈向達致曾昭燏信〉（1943.2.28），《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393。

③ 〈向達致曾昭燏信〉（1943.3.2），《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393-394。

仍留李莊，不過另在蘭州掛一牌子，添些人手而已。既然這樣，陶孟和只能將錯就錯，廣聘人才，著手西進。傅斯年覺得苗頭不對，陶孟和延攬人才研究範圍，與史語所人員多有重合，違反了兩所原來的約定，即社會所只作鴉片戰爭以後，此前則歸史語所處理，這樣一來恐有大規模的重複。傅斯年找陶孟和交涉未果，⁷⁴遂即烽煙四起，相互痛責，私誼蕩然無存。針對陶孟和建立西北研究所，整合歷史、考古、語言、民族、經濟、行政等項資源的構想，傅斯年倡議按照向達的主張設立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並將此事提交院務會議討論。⁷⁵

交付討論的〈本院西北工作站計畫〉，標明是根據向覺明先生西北初步調查報告草擬的。

- | | |
|--------|---|
| (一)、名稱 | 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 |
| (二)、站址 | 設甘肅酒泉 |
| (三)、學科 | 歷史考古、地理、語文民族、氣象、地磁。 |
| (四)、人員 | 歷史考古以向達為主任，其他由史言所推舉、並由中央博物院參加之。 |
| 地理 | 由地理研究所推之。 |
| 語文民族 | 由歷史語言所推。其語文方面兼備蒙、回、藏三項。 |
| 氣象 | 由氣象所推之。 |
| 地磁 | 由物理所推之。 |
| (五)、設備 | 除工作室外，尚須設立圖書室、儀器室、標本室、畫圖室、照相室、測候站、地磁台。依得各所同意，暫運去急切應用之若干書籍、儀器。 |

在草稿中人員名列有向覺明、夏作民、高去尋、李方桂、于道泉、芮逸夫、凌純聲、張寶堃、陳宗器等人，後兩位是氣象、地磁專家。⁷⁶討論的結果，我們暫無從知曉，從陶孟和的「西北研究所」腹死胎中情形來看，傅斯年在向達的幫助下，暫居上風。很可能，向達並不知道在這場風波中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那可不僅僅是敲敲邊鼓、跑跑龍套而已。

⁷⁴ 參見潘光哲，〈「進軍西北」——創立一個研究所的故事〉，《天方夜譚中研院——現代學術社群史話》（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45-52。

⁷⁵ 〈傅斯年函朱家驊〉（1943.1.15），《史語所檔案》李38-7-1。

⁷⁶ 參見〈擬本院西北工作站計劃一紙〉抄本，《史語所檔案》李38-7-1。

七、結束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成立，標誌著西方現代學術被成規模地引入中國，田野的考古發掘調查是其精髓部分。從二十世紀初葉以來，西方考古學家、探險家涉足最多的是西北，他們周密計畫，準備充分，資金豐沛，由一流學者擔綱，當然也就碩果累累，僅此一項便給史語所造成足夠的壓力。傅斯年的學術目標不僅要研究中國本部，亦有瞭解中國周邊宏願，有所謂「虜學」計畫。無奈形勢永遠比人強，日本人的入侵，使史語所本身踏上流亡之路，更遑論學術目標的實現。在有機緣組團前往西北考察時，傅斯年全力推動配合朱家驊的思路。他選擇了治中西交通的名家向達擔此重任，這一點上倒是兩人一拍即合，或為一時不二之人選。向達也是傾家蕩產，全力西進。

不過，考古調查，不但耗時曠久，投資頗巨，更重要的是成員之間要求充分磨合，是一門配合的藝術。既要求配合，無疑就要學會妥協，以團體考量優先。而這些恰恰是中國學者最薄弱的環節，歷時一年之久的西北史地考察團活動，將中國學術界的弱點暴露無遺。這並非僅僅是學者之間的個人恩怨所致，倉促行事，互不通訊，後勤組織全無保障，凸顯出組織者的無序。儘管外部環境不盡人意，每個參與者則全力以赴，努力完成學術目標，尤其是向達在環境惡劣的條件下，苦苦支撐達九個月之久。正是他們的堅持，才促使第二次西北科學考察團的成行，那時向達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

在國家最困難內憂外患交織一起的時候，中國學術團體耗資千萬，傾力西進，把有用之錢，花在這些不急之務上，是否虛糜公帑？不僅在當時就是放在現在，人們也會感到疑惑不解。這裡我們用向達先生的一段話，來結束這篇短文吧：

我們之所以不甘為奴為隸，情願忍受中國歷史上亙古未有的困苦，來奮戰圖存，為的是什麼？還不是為的我們是有歷史有文化的民族。我們有生存的權力，我們也有承先啓後的義務。千佛洞是我們民族在精神方面一個最崇高的表現，保護和發揚這種精神，難道不是我們的義務麼？^⑦

後記：本文能利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檔案》，有賴於邢義田、王明珂先生的大力幫助，另得孟彥弘兄幫助，值此一併謹表謝意。

^⑦ 向達，〈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原載重慶《大公報》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七、二十八、三十日，後收入《向達先生敦煌遺墨》，頁315。

【勘誤表】

《向達先生敦煌遺墨》（榮新江主編，北京：中華書局，2010）一書援引傅斯年圖書館藏《史語所檔案》資料（李〇-〇-〇），編號誤植之處甚多。經請邢義田先生查考原檔案複件，編輯部並據傅斯年圖書館藏整編《史語所檔案》目錄線上檢索系統，勘正錯誤，輯合整理成表，以供學界參考：

頁碼	向達往來信函題名	《向達先生敦煌遺墨》 編號	傅圖館藏《史語所檔案》 編號
頁 413	〈向達致傅斯年〉（1941.5.10）	李 38-2-1	李 14-28-3
頁 414	〈向達致傅斯年〉（1941.8.10）	李 38-2-17	李 38-2-16
頁 415	〈傅斯年致向達〉（1941.11.8）	李 14-28-3	李 14-28-2
頁 415	〈向達致傅斯年、李濟〔電〕〉 （1942.4?6）	李 38-2-11	李 38-2-10
頁 416	〈向達致傅斯年、李濟〉 （1942.6.29）	李 38-2-16	李 38-2-15
頁 416	〈向達致傅斯年〔電〕〉（1942）	李 38-2-2	李 38-2-1
頁 416	〈向達致傅斯年、李濟〔電〕〉 （1942.7.6）	李 38-2-15	李 38-2-13
頁 417	〈向達致傅斯年〉（1942.8?31）	李 38-2-13	李 38-2-11
頁 417	〈向達致歷史語言研究所〉 （1942.9.10）	李 14-28-2	李 10-6-12
頁 418	〈向達致傅斯年〉（1942.9.24）	李 38-2-18	李 38-2-17
頁 418	〈向達致傅斯年、李濟〉 （1942.10.1）	李 38-2-9	李 38-2-8
頁 419	〈向達致傅斯年、李濟〉 （1942.10.6）	李 38-2-10	李 38-2-9
頁 421	〈向達致傅斯年、李濟〉 （1943.3.1）	李 38-2-3	李 38-2-2
頁 422	〈向達致傅斯年、李濟〉 （1943.3.13）	李 38-2-5	李 38-2-4
頁 423	〈向達致傅斯年、李濟〔電〕〉 （1943.6.12）	李 38-2-4	李 38-2-3 （傅圖註記 1943.6.13）
頁 424	〈向達致傅斯年〉（1943.9.21）	李 38-2-6	李 38-2-5
頁 424	〈向達致傅斯年〉（1943.11.4）	李 38-2-7	李 38-2-6
頁 425	〈向達致傅斯年〉（1943.12.2）	李 38-2-8	李 38-2-7

頁 426	〈向達、夏鼐致傅斯年、李濟〉 (1944.4.22)	李 38-4-5	李 38-4-4
頁 426	〈向達、夏鼐、閻文儒致傅斯年、 李濟〔電〕〉(1944.5.19)	李 38-4-12	李 38-4-5
頁 427	〈向達致傅斯年〔電〕〉 (1944.6.29)	李 38-2-20	李 38-2-19
頁 427	〈傅斯年致向達〔電〕〉 (1944.7.11)	李 38-2-21	李 38-2-20
頁 428	〈傅斯年致向達〉(1944.7.12)	李 38-4-4	李 38-2-21
頁 430	〈向達致傅斯年〉(1944.8.22)	李 38-4-15	李 38-4-12
頁 430	〈向達致傅斯年〉(1944.9.24)	李 38-2-19	李 38-2-18